

当代《山海经》研究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 杨萧杨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山海经》是我国上古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在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等多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至少从汉魏时期开始，此书即已受到文人学者的重视。20世纪以来，关于《山海经》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诸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部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笔者则发现当代的《山海经》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简要总结如下。

一、《山海经》与其他早期文献的成书先后问题

《山海经》作者不明，书中也无作者序跋，无法直接看出成书时代。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往往将《山海经》与其他上古时期地理著作进行对比，尤其是将《山海经》的《山经》部分与《禹贡》进行对比，来推断《山海经》的成书时代。在这个问题上，过去主要存在两方面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山经》早于《禹贡》，以顾颉刚先生和蒙文通先生为代表；另一种观点认为《山经》晚于《禹贡》，以谭其骧先生为代表。

顾颉刚先生在《五藏山经案语》中，将《山经》与《禹贡》中的记载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比较^①。首先，顾先生对比了《山经》各篇与《禹贡》各州的相关记载中提及的山川名称。在此之后，顾先生又分析了四个具体问题，即海陆关系问题以及关于“流沙”“昆仑”“衡山”这三个地名的问题。通过这些分析，顾先生得出了《山经》成书时代早于《禹贡》的结论。在海陆关系问题中，顾先生认为《山经》作者想象四方皆有海，《禹贡》作者则已知只有东方有海，这反映出《禹贡》作者突破了古代的幻想，是人们地理知识方面的一大进步。此外，以“衡山”问题为例，顾先生认为《禹贡》中记载“衡山”为荆州南界，岱、荆、衡、华四山在《禹贡》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在《山经》中，“衡山”既不见于《南山经》，又不见于《中次十二经》，这是由于《山经》成书时，人们对南方的“衡山”还没有了解。顾先生认为，从这几个方面都可以看出《禹贡》成书应在《山经》之后。

蒙文通先生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一文中，也将《山经》和《禹贡》中的记载进行了充分的比较^②。蒙先生通过《北次三经》中的“碣石之山”以及《中次七经》中的“役水”等描述，同样得出了《山经》成书时代早于《禹贡》的结论。对于“役水”问题，《中次七经》记载“役水”直接“北流注于河”，酈道元《水经注》则记载“役水”注入“渠水”，此“渠水”即战国时期魏惠王开凿之鸿沟。蒙先生认为，由于《中次七

^① 顾颉刚：《五藏山经（尚书研究讲义乙种三之二）案语》，《顾颉刚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262—266页。

^② 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蒙文通文集》第1卷，巴蜀书社1987年，第35—66页。

《禹贡》记载“役水”直接注入黄河，并不注入“渠水”，因此它描述的应该是鸿沟开凿之前的地理环境，再由此推出《山经》的成书时代较早。对于“碣石之山”问题，蒙先生则认为《北次三经》中记载的“碣石之山”距离海岸较远，《禹贡》中的“碣石”则是“滨海”之山。蒙先生还认为，历史上渤海海岸的变化有着日益向西扩展的趋势，因此《北次三经》中描述的应该是比《禹贡》时代更早的地理环境。根据这些记载，蒙先生也认为《山经》的成书应该早于《禹贡》。

谭其骧先生在《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中，提出了《山经》成书晚于《禹贡》的观点^①。谭先生认为：“《山经》的地域既比《禹贡》大，记载也比《禹贡》详密，人的知识是逐渐进步的，地域大而详密的《山经》自应在地域小而简略的《禹贡》之后。”对于顾颉刚先生和蒙文通先生的具体论述，谭先生也分别作出了回应，并且认为顾先生和蒙先生的大部分论述都不能成立。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山经》和《禹贡》中出现的这些详略不同的记载，可能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不能仅仅根据记载的地域大小或者详略程度来判断它们的时代先后。通过以下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些记载的复杂性。

例如，我国古代最早的关于黄河源头的观点，存在“积石说”与“昆仑说”两种说法。《禹贡》中只有“导河积石”的记载，属于“积石说”；《山经》作者则将“积石说”与“昆仑说”这两种说法进行了整合，形成了“黄河重源说”。可以看出，“黄河重源说”的产生时代应晚于“昆仑说”与“积石说”。但是，不能由此就推断出《山经》的创作时代一定晚于《禹贡》，这些关于黄河的记载差异也可能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先秦时期，各地之间的交通与信息传输都不便利，《禹贡》作者即使生活在《山经》的时代之后，也未必能读到《山经》原文，未必了解“黄河重源说”。即使读到了《山经》原文，《禹贡》作者也未必会采纳“黄河重源说”。也就是说，即使《禹贡》作者的生活时代在《山经》之后，他仍然有可能直接采用产生时代较早的“积石说”。因此，仅凭“积石说”与“黄河重源说”的产生时间先后，并不能推断出《山经》与《禹贡》的成书时代先后。

再比如，对于今天黄河中游以及洛河流域一带的山川，《山经》中的记载要比《禹贡》详细得多。《禹贡》仅在“豫州”与“导洛”两部分提到了伊、洛、瀍、涧等少数几条河流，而《山经》的《中次二经》至《中次七经》等几篇文字中则对今天洛河、伊河、涧河的多条大小支流都有所记载。如谭其骧先生所言，《山经》在这一地区的记载确实远比《禹贡》详密。但是，同样不能由此就推断出《山经》的创作时代一定晚于《禹贡》。如上文所述，即使《禹贡》作者的时代晚于《山经》，由于信息传输之不便，未必就能亲见《山经》原文，也就未必了解这些河流的大小支流分布情况。此外，《禹贡》这部著作以叙述大禹的功业为主，通观《禹贡》全文，可以发现作者描述“九州”时，只需要举出各州最重要的几处山川，就足以说明大禹治理九州的功绩。即使《禹贡》作者能够读到《山经》原文，了解到了这些河流的支流分布情况，也并不需要在《禹贡》中将这些支流一一列出。因此，记载较为简略的《禹贡》之成书时代同样有可能晚于记载较为详密的《山经》。仅凭《山经》与《禹贡》所载山川的详略程度，也不能推断出《山经》与《禹贡》的成书时代先后。

^① 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5—411页。

总之，在《山经》和《禹贡》两部书中，确实存在一些相似的记载，例如“导河积石”和“积石之山，河水冒以西流”的记载等等。对于这些相似记载的产生原因，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第一，可能其中一部书确实承袭了另一部书中的观点，两部书之间存在承袭关系。第二，也可能这两部书分别独立地引用了比它们更早的说法，形成了相似的记载。如果这些相似记载是由第二种原因造成的，那么这两部书之间就不存在承袭关系。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顾颉刚先生、谭其骧先生等学者对《山经》和《禹贡》的原文记载进行研究时，只能分析出这些记载的详略程度以及它们所描述的地域范围远近，但他们都无法在这两部书中找到彼此之间明确的承袭关系。如上文所述，这两部书中的相似记载只是有可能存在承袭关系，但也同样有可能是分别独立形成的。因此，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不能证明其中一部书一定承袭了另一部书，这两部书的成书先后问题也只能暂时存疑，不能断言《山经》的成书时代一定早于《禹贡》或者一定晚于《禹贡》。

《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与《荒经》三大部分，一般认为这三部分内容原先各自成书，后人将它们合编到一起，才形成了今天的《山海经》文本。除《山经》外，在《海经》与《荒经》中同样无法找到它们与《禹贡》等文献的承袭关系，因此也同样不能断言它们一定早于《禹贡》，或者一定晚于《禹贡》。对于《山海经》三大部分的成书年代，只能通过书中记载的其他地理信息来进行分析。

二、《山海经》山川记载的可靠性问题

关于《山海经》的性质，在古代学者中主要有两大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山海经》是上古时期的地理志，例如《隋书·经籍志》等古代书目中，都将《山海经》列为地理类著作。第二类观点不认为《山海经》是地理著作，而将其看作“小说家书”“神话书”“巫书”等性质的著作，这类观点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结论。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山海经》被列入子部小说家类，其《提要》中提到：“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按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可见，《四库提要》认为《山海经》中的记载“百不一真”，不能看作地理著作。

由于对《山海经》性质的认识不同，对于《山海经》山川记载的可靠性，在古代学者中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不认同《山海经》是地理著作的学者，往往将《山海经》所载之山看作神话，并不认为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山地；将《山海经》看作地理志的学者，则往往认为其中所载之山都是当时确实存在的山地。总体而言，虽然《四库提要》并不认同《山海经》是地理著作，但古代绝大多数学者还是将《山海经》看作地理志，并且对其中多数山川的位置进行了解释。例如东晋郭璞《山海经注》、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清代吴任臣《山海经广注》、汪绂《山海经存》、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等著作中，都有大量篇幅用来解释《山海经》所载诸山川的具体位置。

近代以来，诸家学者逐渐注意到了《山经》与《海经》《荒经》这三大部分的相对独立性，多数学者认为《山经》的记载基本上真实可靠，《海经》与《荒经》则以传闻和神话为主。在“《山经》的记载真实可靠”这一前提下，学者们又进一步论述了《山经》所载诸山川的具体地望，谭其骧先生的《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在这篇

文章中，谭先生对《山经》每一部分的地域范围都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例如《西次三经》中神话色彩丰富的“昆仑之丘”，谭先生将其落实为今天的祁连山主峰。^①对于“昆仑之丘”以西的“翼望之山”（亦即《西次三经》最西端之山），谭先生也认为“应指今新疆塔里木西南阿尔金山脉某山”。^②可以看出，谭先生确实认为《山经》诸山都是当时真实存在的山地。

谭其骧先生以后的绝大多数《山海经》研究著作，如张步天《山海经解》、郭世谦《山海经考释》、刘宗迪《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等，虽然关于诸山具体地望的研究结论与谭先生不同，但也同样认为《山经》诸山都真实存在。这就是现当代多数学者的主流观点。

现当代学者中，只有顾颉刚先生等少数学者的观点与上述主流观点不同。顾颉刚先生在《五藏山经案语》中指出：“然诸书有一蔽焉：盖向之疑者视为悉妄，固未当；而清代学者束缚于好古之成见，又视之为悉真，亦非也。此问题之解决，不容如是简单。是中必有神话，亦必有真事实，非经一番分析功夫，必不能使之各得其所而不相混。吾人今日之责任，正在为之分析尔。”^③可见，顾先生发现了以往两大类观点的问题所在。像《四库提要》那样认为《山海经》完全不可信的一类观点，显然并不恰当。但认为《山海经》诸山完全真实存在的一类观点，也是有问题的。顾先生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山海经》完全不可信或者完全可信。《山海经》诸山的记载，其中有一些必定是神话，也有一些必定是真实存在的山地，必须经过仔细分析才能判断其中哪些记载可信。

顾先生还指出：“然以《禹贡》九州所陈与《山经》相配，则东方南方几无有相似之处。《山经》虽举五方，而今所可证实者惟西、北、中三方耳。”^④“以沿海诸州区域之广，何《山经》记载乃如此其脱略？余因以推知《山经》作者必生于河汉之间，其闻见经历未涉东方，故定以汉水之南北为中山；而于今山西、陕西、甘肃诸省之地皆所素详，故叙北山、西山特多证实；至于东之齐鲁，东南之吴越，则已出于其智识范围之外，但得以想像敷衍成篇耳。”^⑤可见，顾先生认为《山经》中有一部分是作者较为了解的地区，另一部分地区则出于作者知识范围之外。对于作者知识范围之外的那些地区，如《山经》中的《东山经》《南山经》等，其记载并不是对这一地区地理环境的可靠记录，而是主要根据作者的想象写出的文字，与真实地理环境差别很大。

可以看出，在《山海经》山川记载的可靠性问题上，顾颉刚先生的观点应该更符合历史事实。先秦时期，各地之间的交通、信息传输极为不便，人们的知识范围非常有限。但是，人们对自己知识范围之外的世界必定有着各种想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载的邹衍“大九州说”，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一种想象。这样，人们在描述他们所认识的世界时，自然会把他们知识范围之内的地理环境与知识范围之外的想象结合起来，再记录下来形成文本。因此，对于《山海经》的记载，应如顾先生所言，既不能完全看作神话，也不能完全看作当时真实存在的山地，而应该看作一部分可靠记录与一部分神话、想象的结合。要研究《山

^① 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长水集续编》，第390页。

^② 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长水集续编》，第391页。

^③ 顾颉刚：《五藏山经（尚书研究讲义乙种三之二）案语》，第260页。

^④ 顾颉刚：《五藏山经（尚书研究讲义乙种三之二）案语》，第263页。

^⑤ 顾颉刚：《五藏山经（尚书研究讲义乙种三之二）案语》，第264页。

海经》诸山川的地理位置，就必须首先对《山海经》中的各条记载进行具体分析，判断它们的可靠性。

遗憾的是，顾颉刚先生的观点在后代学者的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较大的重视。尤其是关于《山经》的部分，顾先生已经指出《东山经》等篇目中的记载与真实地理环境不符，但当代诸家学者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山经》所载的山川真实可信，并且在这个前提下对这些山川的位置进行了考证。实际上，如果仔细审视《东山经》原文，就会发现它与今天山东地区的地理环境完全不符。

《东山经》包括《东山首经》《东次二经》《东次三经》《东次四经》四部分。郭璞注《山海经》时，对于《东山经》诸山，仅在《东山首经》第十一山“泰山”之下注释：“即东岳岱宗也，今在泰山奉高县西北。”酈道元在《水经注》中，明确将《东山经》中的山川落实到现实中的，也只有“泰山”一处。酈道元在《水经注》中，对今天山东一带山川的记载已经非常详尽，如果他发现《东山经》“泰山”附近之山川可以与现实山川对应，不可能不在《水经注》中提及。但是，除“泰山”外，对于《东山经》中的其余山川，郭璞、酈道元都不能指实。这恰恰说明《东山经》描述的山脉、水系情况与今天泰山附近的地理环境完全不符。

谭其骧先生在《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中，将《东山首经》第一山所出之“食水”对应为《水经·淄水注》之“时水”，其地望在齐都临淄之南。对于《东山首经》其余诸山，谭先生也将它们解释为今泰山山脉诸山^①。但是，今泰山山脉为东西走向，《东山首经》诸山走向则为自北向南，与泰山山脉走向完全不符。此外，在《东山首经》“泰山”的相关记载中，还有“环水出焉，东流注于江”一句。泰山一带的河流不可能注入长江，毕沅、郝懿行和谭其骧先生都认为此句“注于江”为“注于汶”之讹。石泉先生在《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一文中，则认为此处之“江”并非长江，而是今天的沂河^②。可以看出，不管是毕沅、郝懿行等人的观点，还是石泉先生的观点，他们首先都认为《东山首经》所载之山川真实可信。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再试图对其中的一些矛盾之处做出解释，但这些解释仍然非常牵强。实际上，应该注意到顾颉刚先生在《五藏山经案语》中的观点。对于《东山经》中的描述，也应该注意到它们可能并非真实记录，而主要是作者根据神话、想象而记载的内容。

如果注意到这个问题，再来看《东山经》中的描述，可以发现作者对当时东部地区的地理环境了解甚少。作者很可能只了解到泰山与长江的存在，却完全不了解泰山山脉的走向以及长江下游地区的水系状况。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作者“但得以想像敷衍成篇耳”。于是，在《东山首经》中，泰山附近的山脉就变成了南北走向，发源于泰山的河流也被记载为“注于江”。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山经》中的描述，才更符合《山经》创作时的真实情况。

因此，对于《山海经》中提到的每一个区域，都应该首先分析其中的记载与真实地理环境是否相符，判断该段记载究竟是对真实地理环境的描述还是以神话、想象为主的内容。如果该区域的记载与真实地理环境完全不符，就无需牵强地将它们与今天的地名对应起来。只

^① 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长水集续编》，第398—400页。

^② 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石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6页。

有在确认该区域的记载与真实地理环境高度相符的前提下,才能将其中记载的山川与今天的地名相对应。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进行《山海经》相关的地理学研究。

三、《山海经图》及其可靠性问题

汉代以来,《山经》与《海经》《荒经》合称《山海经》,此后一直以《山海经》的形式流传。除了《山海经》本身的文字以外,历代学者往往都认为在其创作之时还有相应的地图存在。例如,清代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卷首有毕沅本人所撰《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一文,其中提到:“《山海经》有古图,有汉所传图,有梁张僧繇等图。十三篇中,《海外海内经》所说之图,当是禹鼎也。《大荒经》已下五篇所说之图,当是汉时所传之图也。”^①由此即可看出,毕沅认为《海经》与《荒经》成书之时皆有地图存在。此外,由于毕沅还认为《山经》《海经》为大禹所作,《荒经》则成书于汉代,因此他也就得出了《海经》之图来源于大禹所铸之九鼎,《荒经》之图则为汉代所传之图的结论。

王庸先生在《中国地理学史》一书中,也对《山海经》地图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引用了历史上朱熹、杨慎、毕沅等学者的观点,并指出《山经》创作时也应存在地图。王庸先生指出:“盖据近世人类学者之考查,知地图之作,实见于近今原始民族之中,而图绘之形式,大抵以山川、部落等实际事物为主体。”“故九鼎《山海经》图若均绘有山川、道里等事物,当与此种原始之地图相类。”^②还指出:“至于此类图绘之中,其此山与彼水,此族与彼族之距离远近,并不能以正确之比例表之于图,一如近代之地图然;所能表示者,仅恃文字或符号耳。《五藏山经》中所记又某方若干里,某山至于某泽等文字,疑即图所不能表示而记于二山二地之间者。以是九鼎与《山海经图》,虽有地图之意,而所绘者仍系山川、民族等事物之图,与近世地图之抽象绘法,迥不相侔;惟与中国旧式地图所绘比例不确之山川、道路,而以文字记其里数方位,以及户口、军实之类者,仍属古今一辙;所不同者,人民风俗等实物之图,大抵当较减少耳。”^③可见,王庸先生认为《五藏山经》创作时也有地图(按,《山经》创作时之地图,以下简称《山经图》),其形式以描绘山川、道路等实际事物为主体,与今天的实测地图不同,但与我国旧式地图较为接近。在这种地图上,山川之间的距离不能像今天的地图一样通过比例尺准确地表现出来,因此也就需要通过文字记载来体现。《五藏山经》原文中“又某方若干里”这样的文字,就是对《山经图》的说明。

顾颉刚先生在《〈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一文中指出:“当时必是《山经》有一总图,而作经者割为南、西、北、东、中五部,又各以分量的多少划分为数篇,总计得二十六篇;每篇有始有终,合起来成一整体。”^④可见,顾先生也认为《山经》最初创作时有相应的《山经图》存在。顾颉刚先生以后,多数学者在《山海经》创作时存在地图这个问题上都持有类似的观点。

^① 毕沅:《山海经新校正》,清光绪三年(1877)浙江书局刻本。

^②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18页。

^③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19页。

^④ 顾颉刚:《〈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第5页。

从以上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山海经》创作的时代应该同时有相应的《山海经图》存在。但是,这些学者并没有专门论述《山海经图》所绘山川景物的可靠性问题。如上文所述,历代学者在论述《山海经》记载的可靠性时,基本都只是针对《山海经》的文字而言,并未涉及《山海经图》之可靠性。即使是在《山海经》文字记载的可靠性方面,也只有顾颉刚先生等少数人注意到了《山海经》的记载应是一部分可靠记录与一部分神话、想象的结合,其他近现代学者则大都笼统地认为《山海经》记载可信。因此,对于《山海经图》之可靠性问题,仍有必要作出说明。

笔者认为,与《山海经》的文字记载相似,《山海经图》描绘的山川景物同样是一部分可靠记录与一部分神话、想象的结合。以《山经图》为例,《山经》中记载华夏民族所处的陆地四周皆被海洋环绕。根据王庸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观点,《山经》文字记载中描述的山川景物应与《山经图》所绘一致。因此,最初的《山经图》上绘出的陆地四周也必定都被海洋环绕。此外,《山经》中描述的黄河上游,既有“河水出昆仑之丘”的记载,又有“渤泽,河水所潜”“积石之山,河水冒以西流”等记载,形成了“重源”的现象。由于《山经》的文字描述应与《山经图》所绘一致,因此,最初的《山经图》上也应该存在黄河“出昆仑之丘”“潜流”以及“冒以西流”等描绘。这些景物,与黄河上游的真实地理环境完全不符。显然,这不可能是作者经过实地考察之后对真实景物的描绘。“黄河重源”的描绘和记载,应是《山经》或《山经图》作者将关于黄河源头的“积石说”与“昆仑说”两种早期说法加以整合之后的结果,并不是作者对真实地理环境的描述。因此,这些描绘和记载的可靠性自然存在问题。

由此即可看出,对于《山海经图》描绘的山川景物,与《山海经》的文字记载类似,也不能完全看成作者对当时真实地理环境的描述,而同样应该看成一部分可靠记录与一部分神话、想象的结合。